胡适小传

胡适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学者和思想家之一。在他死后三十多年的今天，中国知识界、学术界仍很关注他。在中国大陆，甚至出现了“胡学热”。

这个现象最适当的解释，就是胡适生前热切关注的一些重要问题，今天仍旧是大多数中国人所面对的。而胡适对这些问题的见解、主张，在今天仍有值得研究的意义。

一、家世与青年时期

胡适字适之，祖籍安徽绩溪。1891 年 12 月 17 日生于上海。1893 年随母亲到台湾其父的任所。他的父亲胡傳(1841～1895）原在上海任官，后奉调到台湾。1895 年，甲午战败，台湾割让给日本，胡傳便先遣妻、子回内地家乡，而自己则在内渡到厦门时病死。从此，胡适便只有与年轻的寡母相依为命。

胡适回到绩溪后，受了九年的传统私塾教育，于 1904 年，到上海就读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和中国公学等新式学堂，开始接触到西学。在这期间，严复、梁启超的著作对他发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公学里，革命气氛很浓，胡适结识了许多革命党的朋友，他被介绍加入竞业学会，并主编《竞业旬报》达一年之久。他用期自、胜生、希疆、适之、铁儿、适庵、冬心、蝶、骅等笔名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后在《竞业旬报》上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和大量的新闻、时评、杂俎、诗词,其中颇有一些激烈攻击旧礼俗和讥嘲政府官吏的内容。这一段办报的经历，对胡适是一种重要的文字训练。可以说,后来他那思路清晰、文字浅显、明白晓畅的文风，这时便初步打下了根基。

1908 年秋天，中国公学发生学潮。学潮的起因是学生反对修改基于民主自治精神的原有管理制度。胡适是反对最坚决的学生之一，他曾和一大批学生毅然退出公学,自立新公学,这个新公学竟在艰苦竭蹶中坚持了一年之久。

1910 年夏，胡适赴北京参加第二届庚款官费留美的资格考试,并被录取。九月入康奈尔大学农科。一年多以后,改学文科。正如他的朋友(又是论敌)梅光迪所说,胡适的改科,实是‘中国学术史上一大关键’[①]。

胡适在 1914 年夏就得到了文学学士学位。但他又留校继续研究。1915 年夏，他决定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②] 学哲学。杜威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美国哲学家，也是世界知名的哲学家之一。他把由皮尔

①见耿云志著《胡适年谱》第 29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年。

②杜威（1859—1952）,先后在密执安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哲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我们怎样思想》、《实验逻辑论文集》、《哲学的改造》、《经验与自然》、《人的问题》等等，他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二十年代左右相继在日本、中国、苏联等国讲学,产生很大影响。

士①、詹姆斯② 所发展起来的“实用主义”哲学，进一步推向新的高度，形成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的一种经验主义哲学体系。而胡适喜欢把它叫做“实验主义”。

胡适在美国七年的留学生活，为他在各方面都打下了基础。

胡适在读书之余，积极参加学校内外的各种活动，他经常被邀请到各地、各种团体去演讲，这几乎成了他一种嗜好，以致荒时废课在所不惜，而且还因此失掉了一份奖学金，一度生活困窘。然而，他因讲演而出了名。后来他于 1914 年获得‘卜朗吟征文奖”,被当地报纸纷纷报道，视为殊荣，使他赢得了更大的名声。

胡适曾在中国留学生会任职，还曾担任康奈尔大学的“世界学生会”会长。在主持各种会议的经验中，他熟悉了西方的议会程序。他还曾十分热衷地参与当地的选举活动。这些经历，对他日后的政治思想、政治信念，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对胡适尤有终生影响的，是他领悟了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他曾说，赫胥黎教会他如何怀疑；杜威教会他如何思想③。思想方法问题，成为胡适一生始终认为最重要的问题。用他的话说，“方法”实在主

① 皮尔士（1839—1914），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生前仅发表过一系列论文，死后有人编成文集八卷出版。其最有影响的论文是《怎样使我们的观念清晰》。

② 詹姆斯（1842—1910）是使实用主义扩大影响的关键人物。然而，他把实用主义应用到宗教经验上去，对此，皮尔士及后来的一些实用主义哲学家都不满意。其主要著作有《心理学原理》、《实用主义》等等。

③ 见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作品集》第二册，第二页。台北远流出版社，1986 年。

宰了他一生的所有著述①.

胡适一生事业的肇端也是在留学时期。胡适在留学期间，受西方写实主义文学影响，深感中国文学脱离了现实和群众，于是产生了“文学革命”的主张。他的主张遭到留学界几个最相熟、最要好的朋友的反对，其中以梅光迪反对最为激烈。他们反复辩论，梅光迪愈辩愈保守，胡适却愈辩愈急进。他终于下定决心：切身尝试用白话创作新文学。

二、文学改良的先锋

1917 年 1 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主张以白话文学代替文言文学。这篇文章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的开篇之作，引起了全国性的反响。胡适也因此名扬海内。他于是年七月回国，即被聘为北京大学的文科教授。

《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编陈独秀是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他积极支持胡适的文学主张。他的《文学革命论》紧接着《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把胡适温和的主张变成了革命的口号和纲领；把学理式的讨论变成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但这场运动始终是围绕胡适的几项根本主张进行的。

胡适的主张有着深刻的学理根据和历史基础。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1．文学不应脱离生活。胡适到美国留学后，有机会大量阅读西方文学作品。他对西方十九世纪的写实主义作家如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萨克雷，法国的都德 俄国的契可夫、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非常钦敬。

① 见《胡适口述自传》第 94 页,台北传记文学社,198 年。

而他对易卜生反映社会现实的戏剧作品尤有兴趣。他深深感受到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那种伟大的艺术力量。对照中国的文坛，其鄙陋十分明显。其最大的缺点“在于徒有形式而无精神”①。胡适认为，欲纠此弊，“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避之”②。所谓‘文之文字”，指的就是白话的或近乎白话的文字。胡适认为，只有用近乎生活现实的语言文字写成的作品，才会易于表现生活的真实内容，才会有鲜活的生命力。

2.文学当以平民为对象。胡适认为中国文学另一弊病是文学家脱离了实际生活，文学的内容既然是实际生活，文学的对象就应以生活中的民众为对象。胡适深鄙那些专供给少数文人，或贵族们赏玩的消遣品。他认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③ 文学既要普及于大多数民众，则只有用大多数民众喜闻乐见的白话才能做到。

3.文学是进化的。胡适和清末以来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是进化论的坚定信徒。他认为，文学和众多社会现象一样，也是进化的。以诗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是一大进化；又变为五、七言诗，是又一大进化；诗变为词，词又变为曲，皆是文学的进化。散文、小说、戏曲的递进演变，也可证明此理。总之，“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学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代替‘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

① 《胡适留学日记》(三)第 844 页，商务印书馆，1947 年。

② 同上，第 893 页。

③ 同上，第 956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① 所谓“文学革命”,就是每一时代的人都应创造适合自己时代的新文学。

由胡适等人倡导起来的文学革命运动,遭到旧文人和旧势力的顽强抵抗。还有很多人对白话文学应否占据文学正宗的地位持怀疑态度。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一方面对旧势力的攻击予以坚决的回应;另一方面,继续深入地讨论和阐明白话文学必将代替旧的文言文学而成为文学正宗的道理。

继《文学改良刍议》之后,胡适发表了大量有关文学革命的文章。其中有几篇影响特别广大而深远。

1918 年 3 月,胡适发表《论短篇小说》,提倡学习西方写实主义文学大师的技法,从创作短篇小说做起,为中国新文学开辟新路。接着于四月间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标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一中心口号。他指出:“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② 文章还系统地提出了创造国语的新文学的方法,包括搜集材料的方法,结构的方法,描写的方法等等,有许多是中国旧文学家们所不曾闻见的新观念。这是文学革命中最有份量的一篇论文。文学史家邓振铎誉之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③. 1919 年 10 月,胡适在《星期评论》的双十节纪念号上发

① 《逼上梁山》,《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 9 至 10 页

② 见《胡适文存》卷一,第 74 页,亚东图书馆,1921 年。

③ 见邓振铎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第 4 页。

表长篇论文《谈新诗》，总结了他自己和许多同道们数年来尝试作新诗的经验，提出了对新诗创作中最关键的问题——音韵问题的崭新见解。他认为，新诗的音节“全靠两个重要分子：一是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是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的和谐。至于句末的韵脚，句中的平仄都是不重要的事。”当时新诗最受攻击的就是说它无韵。胡适的看法，打破了传统成见，为新诗的成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胡适并论证，用白话写新诗，最能委婉、细腻地表达感情，朴素真实地描写景物。新诗的发展乃是《诗三百篇》以来诗歌发展的必至之势。著名新诗诗人朱自清说，胡适的《谈新诗》“差不多成了诗的创造与批评的金科玉律”①。足见此文影响之大。

在此期间，胡适还就文学的历史进化问题、戏剧改革问题、文学改革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问题等等发表文章或通讯，个别做出精要的阐释。作为文学革命倡导者，他的这些著述自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后来胡适回顾文学革命的历程时，总感到有一种遗憾，觉得自己“提倡有心，创作无力”。胡适的文学作品确实不多，尤乏传世之作。但也并非无所作为。他翻译的《短篇小说集》，他创作的新剧《终身大事》以及几篇短篇小说，都曾产生过良好的影响。尤其是他的白话新诗集——《尝试集》的出版，可说是中国新文坛的一件大事。著名的文学史家陈炳堃说：“《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建立新诗的轨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

①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第 2 页。

赏里的快感；而在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气。”① 1936 年,胡适写了一篇《谈谈胡适之体的诗》,对他所提倡的白话新诗作了这样的总结:“第一,说话要明白清楚”;“第二,用材料要有剪裁”;第三,意境要平实②.

由于胡适的倡导和他的一群朋友们的努力，白话文学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学的地位，白话的国语也终于得到社会的认同。1919 年“五四”运动的发生，大大促进了这一过程。当时白话报刊风行全国。自 1920 年起,政府明令规定,小学采用白话新课本。可以说,胡适提出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和目标,此时已获得了社会的承认。

三、在新文化运动中

国内史家通常都把《新青年》杂志的创刊定为新文化运动的肇始,这大体是不错的,没有《新青年》,就谈不上新文化运动。但必须看到，当陈独秀于 1915 年 9 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的时候，还只是少数人在上面发表一些有关思想解放意义的文章，发行量很有限，远远谈不上甚么“运动”。只是到了陈独秀北上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在北京出版,并发表了胡适、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的文章以后，才真正具有了全国性反响和形成运动的气象。所以，文学革命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支先锋部队。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是面向青年的运动。而当时最使广大青年为之激动的，是个性解放与思想自由。胡适于 1918 年 6 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

①陈炳堃:《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第 227 页。

②见台北《自由评论》第 12 期,现收载于《胡适手稿》第 10 集。

义》，被视为“个性解放的宣言”。文中借易卜生之口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要发展个人的个性；‘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①。他要青年人充分认识自己的价值，发展自己的个性。要他们明白：“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②

要发展个性，要最大限度地造成使每个人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必须以社会自由为条件。胡适主张：“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养成一种自由的空气。’③ 1920 年 8 月，他同北大教授蒋梦麟、李大钊、高一涵等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严厉抨击北洋政府实行假共和真专制，要求废除一切破坏人民言论、出版、结社、迁徙及人身等自由权的法律和命令，切实保障几种最基本的人民自由权力。对于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的胡适来讲，这些主张，是他终生坚持不渝的。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已经养成了一种自由主义知识领袖的风范。

新文化运动也为教育改革提供了契机。他就任北大教授的头一年，就创办了北大第一个研究所——哲学研究所，提高了教师、学生的研究兴趣，进一步造成高等学府应有的环境气氛。他倡办教授会，实行教授治校；又支持学养较高的学生举办各种文化团体，出版刊物；鼓吹平民教育，推动女子教育，……他的有关女子贞操问题，女子人格问题，女子社会作用问题的言论

① 见《胡适文存》卷四，第 34 页。

② 同上，第 32 页。

③ 《不老》，《胡适文存》卷四，126 页。

和文章，都成为中国女子解放运动的重要文献。

1919 年 11 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最清楚明白地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纲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贯穿这个纲领的基本精神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是最具革命性的思想和态度。从这种态度出发，才能摆脱对旧事物、旧教条、旧经验的迷信；敢于借鉴祖宗不曾用过的新观念、新方法，要对过去的历史文化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创造民族的新文化。胡适之所以能以一刚刚归国的留学生，一最年轻的大学教授，而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这同他高屋建瓴地提出新文化的纲领是分不开的。

胡适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受到了具有保守倾向的文化领袖们的反对。首先是梁漱溟于 1921 年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认为印度、中国同西方的文化走着各自不同的路，学习西方文化会把青年引到追求物质生活和扩张个人欲望的错误道路上去。张君劢则在 1923 年发表《人生观》的讲演，宣称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提倡科学只会引导人们‘务分逐物”，他甚至认为科学要对世界战争的大祸负一定的责任。

胡适批评了梁漱溟和张君劢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文化倾向，先后发表了《评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科学的人生观〉序》，提出了人类文化同一性的观念，他指出中国、印度将来亦必定走上科学与民治之路；而任何排斥科学的言论，在我们科学极端落后的中国，都有开倒车的嫌疑。

1926 年，胡适发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着重阐释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性尖锐批驳了那种把西洋文明看作是物质文明，把中国文明看作是精神文明，并宣扬这种精神文明具有永恒

的价值，西洋的物质文明相比之下则显得有没有甚么价值等谬论，坚持推动中国新文化继续进步。钱玄同称胡适是中国“思想界的医生”①。

四、新学术的开拓者

文学革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使胡适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但真正为他在学术上奠定不拔之基的是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一书。此书于 1919 年 2 月出版，不到两个月即售罄再版。足见此书受欢迎之程度。此书以方法和见解的新颖，而引起学界的极大注意。蔡元培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说，治中国哲学史必须具备两种本事：一是深厚的“汉学”功夫，二是系统的方法。后者在中国学术史上甚少可以借鉴的东西，必须借鉴西洋哲学史。然而懂“汉学”的人很少懂得西洋哲学史。而懂得西洋哲学史的人，又多不具备“汉学”功夫。惟有胡适，既懂西洋哲学史，又有深厚的“汉学”功底，胡能成就此书。在中国，以新方法治中国哲学史，胡适是开山的人。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一书的主要特点是,首先，胡适在鉴别材料上要严谨得多、科学得多。从前讲哲学史的老先生们，往往花一年多的工夫，讲伏羲到《洪范》的种种传说。胡适却只从《诗经》等几种可靠的文献中取材，从老子、孔子讲起。单是这一点就具有极大的解放作用。其次，全书极注意条理系统。胡适在《导言》中说：“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

①钱玄同致胡适的信（1925年春),见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40 卷,第 354 页。黄山书社，1994 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① 他相当成功地贯彻了这一点，而且比后来一些哲学史家们强古就今、生搬硬套地用现代哲学角度去解释古人思想的做法要好得多。第三，摆脱儒家正统的观念，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古代各派哲学，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最后，全书特别突出哲学方法问题。他明确指出，先秦诸子哲学都有自己的哲学方法，书中勾画了这些哲学方法在历史上演进的轮廓。对墨家学派的逻辑思想，书中论述尤详。给哲学方法以首要的意义，是胡适此书的最大特色。而此书之所以能影响一整代青年学子，主要原因亦在于此。

这本书既是开创性著作，在材料和见解上难免有错误。但这丝毫不会减低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胡适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还由于他在另一个领域取得了同样的，甚至是更加辉煌的成就。这就是他对几部影响广泛的古典小说的考证和研究。

1920 年 7 月，胡适写成两万多字的《〈水浒传〉考证》。文章用严谨的考证方法求出水浒故事的历史演变，揭出其中几个主要典型人物的创造过程，以及《水浒》成书之后的版本源流与变迁。这种推寻历史演化轨迹的方法，是中国传统考证学的一种新的发展，它启发了年轻的历史学家顾颉刚。顾氏在其《〈古史辩〉自序》中说,这篇《〈水浒传〉考证》给他以有力的启示，使他相信，古史传说亦可应用这种方法加以研究。他所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显然与胡适的启示有紧密的关系。

①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第 31 页,商务印书馆，1922 年第八版。

1921 年 11 月,胡适又写成《〈红楼梦〉考证》。这篇文章在学术界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它打破了清末以来种种附会的索隐派‘红学’的迷雾,首次提出《红楼梦》一书是作者自叙身世的写实主义的小说,他考定作者曹雪芹的家世际遇及写作《红楼梦》有关的背景情况。文中的一些材料和见解,后来虽经作者本人和其他学者作了不少修订,但此文的最大贡献是把以往旧文人猜谜式的《红楼梦》研究,引上了学术研究的正当轨道,使‘红学’成为一种专门学术对象,对于中国文学史研究具有极大的解放作用和创立新规范的意义。

在以后数年中,胡适相继写了十几篇古小说考证的文章。经他考证又重新出版的古典小说,一时都成了畅销书。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最佩服胡适的小说考证文学,认为是无人可及的上品。

作为早享大名的学者,如此津津有味地作小说考证,这是同他更大的学术目标相互关联的。前面曾提到,胡适的新文化纲领便提出过“整理国故”。胡适认为,过去的一切文化历史都是国故。这些曾经流行一时,甚或流传几世纪的古小说,当然是国故之一种。中国人要走向现代世界,应当对过去的文化遗产作一番评判整理的工夫。一要弄清真相,二要重新估定价值。其中后者尤为重要。胡适指出,整理国故“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①。“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

① 《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卷四,第 162 页,亚东图书馆,1925 年第八版。

值’①。简言之,“我们的使命是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②.

1923 年 1 月,胡适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是北京大学出版的最重要也是最有成绩的学术刊物。胡适是该刊的主持人。他在宣言里提出:一、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二、要用系统的方法来整理国学研究的材料;三、要用比较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胡适的文章成了当时整理国故的学者们共同的纲领。

在整理国故的带动下,古史的研究出现了兴盛的气象。胡适所提倡的“疑古”口号,很得一部分学者的赞同。疑古是针对“信古”、“泥古”的思想提出来的。从前治古史的人,对古代文献,甚至是古代的传说,往往不作严格的考辨,皆作为历史的材料。有些稍具眼光和判断力的人,特别是清代一些考证学者,也颇做一些辨伪的工作。然而,他们对儒家经典,不敢怀疑,所以仍难求信史。胡适的“疑古”精神,就是要求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根据的材料。他主张“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③.

胡适的“疑古”的态度,颇受到一些学者的攻击。当然,“疑古’难免有因疑而失误。但平心而论,因‘疑古而失之”,确比因‘信古而失之’为愈。因为疑是为求信。因疑而失,自己可有机会求得新证据而致信。反之,因信而失,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不疑而信,故难自省悟,有导致盲从迷信的危险。

① 《整理国故与打鬼》,《胡适文存》三集卷二,第 211 页,亚东图书馆,1930 年。

② 《胡适的日记》《1922 年 8 月 26 日》。

③ 《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第一册.第 12 页。

本着无征不信的态度，胡适在写中国哲学史的后半部的时候，遇到禅宗史的问题。他发现，国内现有禅宗史料太少，无法写下去。一直等到 1926 年，胡适利用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的机会，才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查得一批禅宗史的材料,归国后加以整理,相继写出《荷泽大师神会传》等数篇讨论禅宗史的文章。此后，禅宗史便成为他最感兴趣的学术课题之一。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曾把胡适有关禅宗史的著作集为《胡适禅学案》一书出版。

五、无结果的政治“努力”

胡适留学归国的时候，曾暗下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力图“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①。但五四运动把尖锐的政治问题提到每个人的面前。当他看到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时候，当他看到无数青年因愤慨军阀专制、恶势力横行、国家前途昏暗、人民痛苦而醉心于无政府主义的时候，他从自己的信仰出发，发表了后来自称为“政论的导言”的著名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认为,中国问题太多,只有一个一个地逐一求解决，不可能有什么根本解决。所以高谈主义是无济于事的，必须研究实际问题。他竟讽刺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② 他实质上是反对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胡适的文章理所当然地受到李大钊等人的批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使胡适与李大钊、陈独秀的思

① 《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 96 页。

② 见《胡适文存》卷二,第 148 页。

想分歧公开化。此后,围绕《新青年》要不要谈政治,要不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令双方的分歧更形加剧。当《新青年》最终变成了共产主义者的机关刊物的时候，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翼遂另谋创办一个谈政治的刊物。

1922 年 6 月,胡适同他的几位好友丁文江、任鸿隽、朱经农、王征等组织了一个叫“努力会”的小团体。其《章程》中列有一条“:我们当尽我们的能力——或单独的或互助的——谋中国政治的改善与社会的进步”①。第二年 5 月,在胡适主持下,《努力周报》创刊。在该报第二号上，胡适发表了他的政治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争取建立一个“好政府”作为现阶段政治改革的起首目标:“好政府”,就是一个“害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个实行“有计划的政治”的政府②。同时他还提出召开南北和会、实行裁兵、裁官、改革选举制度、整顿财政等项主张。因为有一大批学界教育界名流，包括蔡元培、王宠惠、梁漱溟以及李大钊等十六人在这份宣言上签名，所以在社会上颇引起一些反响。但终究是“书生论政”，没有人肯实行他们的主张。

1922 年 10 月,在《努力周报》第廿二号上,胡适发表《国际的中国》一文，乃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而发的。文中攻击中共以反帝为基调的宣言是一派“瞎说的国际形势论”。此时只须“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去做，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步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③.

① 见耿云志著《胡适年谱》,第 95 页。
② 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 28 页。
③ 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 128页 之 1。

尽管胡适一再宣称所谓国家内部的改革才是惟一出路，尽管他提出了许多改革的主张，但中国政局的昏乱却毫无解决的头绪。1923 年 10 月，曹锟贿选当上总统，污浊的政治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胡适自己也承认："今日反动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上了壁了"①。

胡适办《努力周报》，本来是出于一种"忍不住"的政治上的努力。结果毫无所得。他自己说："《努力》里最有价值的文章恐怕不是我们的政论，而是我们批评梁漱溟、张君劢一班先生的文章和读书杂志》（作为《努力周报》的附刊而发行——引者）里讨论古史的文章"②。

六、漫游归来的际遇

1926 年 7 月，南方革命政府发动北伐战争之际，胡适因获邀参加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的会议而经莫斯科赴英国。在莫斯科参观访问期间，胡适对其印象颇佳，在给国内朋友的信中有所称道。北洋方面的一些人，因此认为胡适"赤化"了。胡适在欧游的半年中，还在大英博物馆及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敦煌卷子，所得资料不少。这些便成为他作禅宗史研究最主要的依据。

1927 年"四·一二"事变爆发，南方国共分裂。胡适身处外地，他因与陈独秀、李大钊是好朋友，又有称赞苏俄的言论。故被北洋政府视为革命军的朋友。在南方，共产党早就把胡适看成是"反动"人物了。即使

①《一年半的回顾》，《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 150、151 页。

②见《胡适论学近著》，第 150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